



新·闻·传·播·学·文·库

作为政治的传播

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

赵云泽 / 著

Communication

as Poli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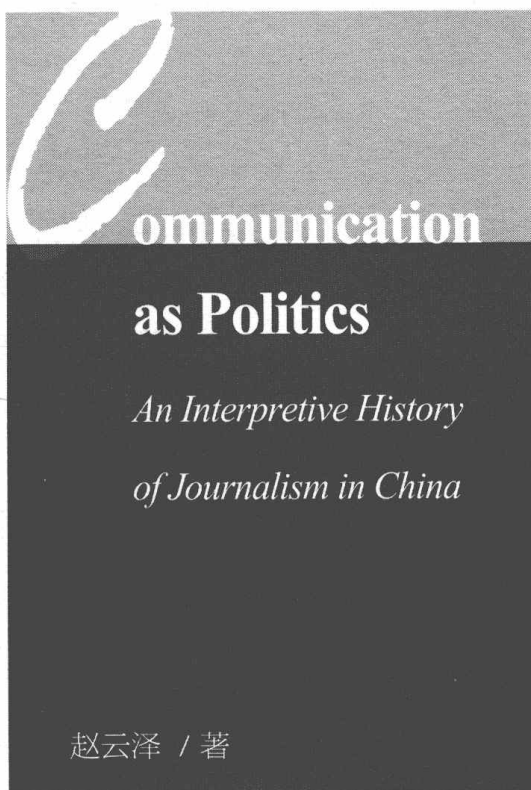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Journalism in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传·播·学·文·库

作为政治的传播

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为政治的传播：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赵云泽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

(新闻传播学文库)

ISBN 978-7-300-24165-4

I. ①作… II. ①赵… III. ①新闻事业史—中国 IV. ①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4171 号

新闻传播学文库

作为政治的传播

中国新闻传播解释史

赵云泽 著

Zuowei Zhengzhi de Chuanbo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开本

印 张 20.5 插页 2

字 数 27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诞生：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传播活动	1
第一节 史官记事	2
第二节 官方文书通讯	5
第三节 采风	8
第四节 乡校议政	14
第二章 作为统治工具的传播媒介	16
第一节 露布	16
一、露布形态的演变	17
二、露布的功能	22
第二节 榜、制（诏）书、悬书、扁书	25
第三节 从情报通讯到官方媒介的邸报	30
一、邸报的产生	30
二、邸报的演化	32
第四节 民办的小报	34

第三章 作为新知与意识形态桥梁的在华外国人报刊	37
第一节 媒介自身便为“新知”	37
一、西人带来的媒介技术革命	38
二、通信、交通技术使时间战胜空间	40
三、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	42
第二节 报刊作为连载的“百科全书”	46
一、南洋漂来的西学	46
二、传播西学的集大成者——《万国公报》	49
三、其他在华外国报刊传播新知的概况	51
第三节 作为意识形态桥梁的外国人报刊	52
一、启蒙言论自由	52
二、介绍政治制度与宣传主权在民	55
三、中国问题的讨论	57
四、外报在华的复杂情愫	62
第四章 作为启蒙与解放工具的新式报刊	65
第一节 知识话语权的唤醒与突破	66
一、报禁的突破	66
二、报刊的唤醒与启蒙	69
第二节 改良抑或革命？ ——一场关于如何解放的辩论	77
一、报刊作为解放的武器	77
二、改良还是革命？	80
第三节 妇女报刊与女性解放	87
一、妇女报刊与女报人的出现	88
二、妇女解放思想的宣传	92
第五章 作为公共领域的民国文人报刊	95
第一节 文人办报与公共领域的酝酿	96

一、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与文人报刊崛起	96
二、文人报刊对民国公共领域的构建	101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时期报刊对公共领域的构建	106
一、文人的呐喊——新文化运动时期言论空间的开创	108
二、文人报刊对新文化公共论坛的构建	112
三、报刊的编读交往的形成	115
第三节 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进一步成熟	120
一、秉持“四不”主义的新记《大公报》	120
二、文人报刊的绝唱——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	122
第六章 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大众传播媒介	135
第一节 从“争取自由”到“专制工具”——中国资产阶级新 闻观	137
一、反封建的阶级斗争工具	137
二、从“标榜自由”到“专制工具”	142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党报模式的确立	146
一、中国无产阶级早期报刊实践及办报理念	147
二、党报理论体系的建立	151
三、“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强调	159
第三节 政治运动中的大众媒介	161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业改造和政治批判	162
二、大众传播不断“左倾”的十年	170
三、“文革”中的新闻业	179
第七章 在政治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大众传播媒介	184
第一节 新闻界的“拨乱反正”	184
第二节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业走向市场运作	188
一、《市场》报的诞生和报刊广告的重现	190
二、读者调查——受众话语权的提升	193

三、“利改税”——媒体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195
第三节 《苦恋》风波——政治批判的降温	197
第四节 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与深度报道的兴起	201
一、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讨论	201
二、“渤海二号”事故报道——负面新闻的突破	202
三、深度报道的兴起	205
四、舆论监督的加强	206
第五节 “正面宣传为主”的强化	208
第六节 从对“报纸商品属性”的肯定到“传媒产业化”	210
第七节 市场化报业的迭进与“繁荣”	214
一、周末版、周末报的热潮	215
二、晚报的复兴	217
三、都市报的勃兴	219
四、厚报时代的来临	223
五、报业集团化之路	224
第八节 电视新闻：从“新闻立台”到“娱乐至死”	227
一、电视新闻的“深度”改革	227
二、娱乐节目的泛滥	230
第八章 媒介革命	235
第一节 作为“第四媒体”兴起的互联网	235
第二节 中国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其特性	238
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先锋话语上的互动与合作	238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	243
三、网络话语权的阶层性	246
四、政府与民众协商机制的出现	248
五、中国网络公共空间的局限性	250
第三节 记者职业地位的陨落	252

一、“自我认同”的贬斥：从“无冕之王”到 “新闻民工”	252
二、“社会认同”的错位：是“舆论监督者”还是 “社会建设的参与者”？	255
三、陨落的不仅仅是地位	259
第四节 消解在互联网语境中的深度报道	263
一、从“独家的深度”走向“众说的深度”	264
二、从“居高临下的说教”走向“平等参与的讨论”	265
三、从“他把关的深度”走向“自把关的严肃阅读”	265
第五节 传统媒体衰落的结构性和社交媒体的兴起	267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多数传统型媒体成为 冗余的资讯生产机构	267
二、机构刻意维持的臃肿的传统型媒体	269
三、摆脱控制的“新新媒体革命”	270
结语：“传播即政治”	274
一、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之下演进的 新闻传播媒介	275
二、“看得见”的新闻传播媒介与“看不见”的新闻 传播媒介	276
三、作为“新知”“启蒙”与“解放”工具的新闻 传播媒介	278
四、阶级斗争与新闻传播媒介	279
五、疲惫的受众与媒介革命	281
参考文献	283
后 记	307

第一章 诞生：辅佑政事与延揽民意的传播活动

“新闻传播”活动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人类社会产生后新闻传播活动也随之产生，否则人们无法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社会活动。恩格斯将人类的进化分为“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人”，随着后者的出现，人类社会也产生了。^①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只能与完全形成的人同时产生”^②。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中国最早著录于古籍的新闻事件是殷代先祖王亥被杀战争。王国维在大甲殷墟卜辞（甲骨文）中发现，殷祖先中确有王亥其人，证实了《尚书》《山海经》中关于此事的记载。根据年代推算，这件事情发生在夏代中叶，相当于公元前1900年前后。^③

多处史料证实，中国在进入夏朝的奴隶社会后（公元前21世纪），新闻传播活动就已经比较频繁了。在当时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战胜大自然，组成团结有力的社会组织生存下来，是人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因此在奴隶社会的一些开明阶段，帝王统治表现出朴素的民本思想。而早期有组织的对社会公共信息的传播活动表现出了“辅佑政事”和“延揽民意”的社会功能。这两项社会功能的诞生既是并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共同体存续下来的需要，也体现出新闻传播活动本质上的政治属性。实际上，这两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13-514.

②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0.

③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22.

政治功能一直都在伴随着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专制”和“民主”两种政治框架的碰撞和演进，这两项功能也此消彼长。在历史的发展中，“专制”制度占主导地位时，新闻传播活动“辅佑政事”的功能也相应成为主要职能；而“民主”制度见长之时，“延揽民意”的职能便更受青睐。但无论何时，这两种职能都长期相伴而存在，没有一种因被压制而消失。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以前，类同于新闻传播活动的主要形式有史官记事、官方文书通讯、采风、乡校议政等。这些传播活动对当时及后世的政治生态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史官记事

先秦时期的史官记事和后来的史官记事有所不同，后代修史多修前代之史，而先秦时期的记史则更强调即时性和广泛的传播效果。

中国的史官制度可以追溯到夏朝设置的“太史令”官职，也称“太史”。《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就记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①即夏朝的太史令终古看到夏桀骄奢淫逸，民怨沸腾，于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哭泣着谏言桀。然而桀对终古的好言相劝充耳不闻，“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于是终古携带着夏朝的地图、律令，投奔了商汤。（对这位投敌叛国的太史令，《吕氏春秋》非但不予批判，反而在其《先识览》篇中开篇就表明太史令终古是有道之人，认为凡是国家濒于灭亡的时候，有道之人一定会事先离开，古今都是一样。）终古也成为迄今为止有文献可考的中国第一位史官。

史官记事制度的设立可谓是当时的贤达君王颇费苦心之作，它既可以

^①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下 [M]. 梁运华，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9：395.

将重要的事情记录、存档，也可以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广而告之，且鼓励史官们秉笔直书。这使得后世的君王谨言慎行，群臣对先贤也可广而议之，国家机器因此能减少暴力的实施而走向文明的善治。

商代史官制度更加完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列举了“尹”“多尹”“乍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北史”“卿史”十种，统称巫和史，分别掌管天道和人事，属于神职人员。商朝是我国神权政治的鼎盛时期，因此史官“巫”的作用更明显。^①到了西周时期，史官制度在商的基础上，分工更加细密，也更加务实于人事。《礼记·王制》记载：“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②其中“大史”即太史，是西周时期的一种史官，“执简记”指的就是手持简册记录重要的事情。“奉讳恶”就是直陈善恶、劝谏君主的意思。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的史官之职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职责各不相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③“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④“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昭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⑤“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⑥“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⑦此外，还有“左史”“右史”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就有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

① 钟其炎. 先秦史官的职责与地位变化 [J]. 档案与建设, 2008 (5).

② 王文锦. 礼记译解：上 [M]. 北京：中华书局，2001：185.

③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2079.

④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2098.

⑤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2129.

⑥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2136-2139.

⑦ 孙诒让. 周礼正义 [M]. 王文锦，陈玉霞，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7：2140.

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①

先秦时期的史官记事强调即时性和广泛的传播效果，以及对时局产生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同后来专门的新闻传播活动极为类似。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侯联合诸侯共同讨伐秦国一事，晋国的栾黶对主帅荀偃的做法不满，带兵从前线撤回。这时，“左史谓魏庄子曰：‘不待中行伯（荀偃）乎？’庄子曰：‘夫子命从帅，栾伯（栾黶），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②当栾黶不听从主帅的命令时，左史马上询问他的部下魏庄子的看法，记录下来并及时传播。又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和赵王在渑池会盟，秦王要求赵王鼓瑟，秦国的御史马上就写道：“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③可见战国时，史官会随行出席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并进行实时的记录，其内容还会广泛传播。

由于这种及时、广泛的传播影响很大，执政者对史官们的如椽大笔也颇为忌惮，甚至是忌恨，而能够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会为世人所敬重，为史家所推崇。春秋时的董狐即被赞誉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荒淫无道，赵盾屡谏无果，反而遭到晋灵公陷害，被迫逃亡。他出逃后晋灵公被赵盾的族弟赵穿率兵所杀。此时赵盾还未出晋国边境，听到消息后便赶回继续执政，又立晋灵公的弟弟为君王，赦免了其弟的罪责。太史董狐在简策上记载“赵盾弑其君”，并且“以示于朝”。赵盾不满反驳，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回答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④（你是国家的正卿，逃亡还没有越过国境，未断君臣之谊，返回来也不讨伐弑君之人，不是你还有谁？）赵盾无奈，只能接受。

① 班固·汉书 [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1525.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1009.

③ 司马迁·史记 [M]·北京：中华书局，2011：2150.

④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663.

董狐之所以能够秉笔直书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实际上与赵盾是“良吏”也是分不开的。事实上，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手下人杀死君主齐庄公，齐国史官记载：“崔杼弑庄公。”大权在握的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记录，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崔杼才停止了杀戮，任由其记录。（“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①）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真实，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当然这也显示了史官及时记录、“以示于朝”的强大传播效果。

史官记事并不仅作档案存储之用，它的广泛传播，还起到了使君主、大臣们引以为戒的作用，有助于使国家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史官的记载极其简洁，没有修饰性的描写，单纯记录事件，所秉持的原则也并非个人好恶，而是秉笔直书的“礼义”规范。

第二节 官方文书通讯

“人类有政治之组织，即有法令。有文字之法令，即有公牒。”^② 一个政权要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让民众了解各种政令。这就要求统治者要有将重要通知广而告之的方式和制度。在中国，这类通知的载体是官方文书。官方文书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合集》第20576号片记载：‘庚申卜贞，雀无祸，南土骨告事？’即庚申日占卜询问：雀（部族或首领名）没有祸，南方骨告何事？这‘骨告’或许就是把事情刻写在甲骨上进行消息传递，如果这一估计不错，说明商代已出现了原始简明的

① 司马迁·史记[M]·北京：线装书局，2006：148.

② 徐望之·公牒通论[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1.

文字通讯，而它便是中国古代最初始的官方通讯文书。”^① 而较为常见并且已经被考古证实的是铸鼎铭文。铸鼎铭文稍晚于甲骨文，产生于商周。“凡关涉政治、军事、外交、祭祀、刑罚、诉讼、契约等重大政治事件或社会生活方面的问题，几乎都要铸刻于青铜器上，留传于子孙后代。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上述大多铭文极具新闻的特性。”^② 比较典型的铸鼎铭文有反映赏赐册命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等，反映征伐功勋的《虢季子白盘》《利簋》，反映契约争讼的《卫盂》《鬲攸从鼎》《格伯簋》等。除此之外，还有竹木刻书的方式。1979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了一封秦国士兵的家信，这封家信“实际上就成了传播秦国军队伐楚淮阳之役战地新闻且战况不利消息的媒介”^③。此外还有郑国子产的铸刑书、邓析的刻竹刑和晋国的铸刑鼎等^④。这些都具有了新闻传播雏形的特征。

在战国时期，还有一种新的文书形式，这就是“檄”。《文心雕龙·檄移》记载：“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⑤ “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播诸视听也。”^⑥ 可以看出“檄”指公开发表的文书，主要用于军事活动中对敌方的声讨、震慑。此处还有“或称露布”的记录，但“檄”和“露布”并非同一类文书，刘勰的记载只是孤证。《文心雕龙》中记载檄：“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意隐。”“檄”和“露布”确实有着“露板以宣众，不可使意隐”的共同之处，又

① 杨师群. 中国古代新闻传播体制的历史教训 [J]. 上海: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08 (6).

② 方晓红. 中国新闻简史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3-4.

③ 倪延年. 中国古代报刊发展史 [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20.

④ 费银银. 我国古代军事信息传播研究——以檄文、露布、塘报、旗报、牌报为中心 [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3: 20.

⑤ 吴林伯. 《文心雕龙》义疏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380.

⑥ 吴林伯. 《文心雕龙》义疏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382.

都是与军事相关的文书。但考之后世，确也再没有人把“露布”与“檄”混为一谈。^① 多处史料显示“露布”是汉代以后的一种新的文书。

官方通讯文书形成后，需要向国土内的各个地方传播，这就要依赖邮驿制度。《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说：“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② 朱熹注：“置，驿也；邮，驛也，所以传命也。”“所谓置邮传命，就是利用驿道、驿站、传车或步行等交通工具、交通方式，来传递信息，传达政令，传送军情，交通使者的一种方式。”^③

先秦时期邮驿有“置”“邮”“传”“遽”“驛”等不同的名称，汉朝始称“邮驿”。其中“置”指驿站，或表示用车马传递信息，如《韩非子·难势》：“五十里而一置。”^④ “邮”也是驿站，或表示供应食宿和车马，如上文提到的“置邮而传命”。“传”（音 zhuàn）是驿站所备的车，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周公旦从鲁闻之，发急传而问之。”^⑤ “遽”的本义是送信的快车或快马，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郑。”^⑥ “驛”指驿站专用的车，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乘驛而见宣子”^⑦。还有一种“徒”，即徒步行走，但它与通常的步行含义不同，特指官员、使者、送信人在某种情况下舍车而徒步，以传递信息。^⑧

在先秦时期，邮驿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制度，广泛应用于政令传达和军事信息的传递，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期尤其发达，官方文书通讯也借此而发达。

-
- ① 吴媛. 论《文心雕龙》对“露布”的误解 [J]. 太原: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② 杨伯峻. 孟子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43.
- ③ 李敬一. 中国传播史: 先秦两汉卷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49.
- ④ 张觉, 等. 韩非子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595.
- ⑤ 张觉, 等. 韩非子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467.
- ⑥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95.
- ⑦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M]. 修订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60.
- ⑧ 李敬一. 中国传播史: 先秦两汉卷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6: 49.

第三节 采风

类似于采风的民意延揽活动可以追溯到上古的尧舜时期。《吕氏春秋·不苟论》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①，“鼓”和“木”的作用就在于为百姓的发声和言论的上达提供一个机会。百姓如看到尧有过失，就可击鼓谏言；舜则树立谤木，百姓可在其上刻写舜的过失，舜看后则改正。

到了夏代，“夏禹不仅立谏鼓，而且设置了五种器具以广纳不同性质和内容的意见”^②。《鬻子》上有：“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篋篋，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鞀。’”^③

这种延揽民意的方式后来慢慢变为“采风”。“上古的采风就是采诗，‘风’即‘风诗’，亦即《诗经》之一体——‘国风’。”^④《毛诗序》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⑤在汉人看来，“‘风诗’具有反映舆论的政治谏议功能，统治者对待这种舆论、讽谏采取宽容的态度，才是符合先王之道的”^⑥。

《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师旷称引《夏书》之言曰：“遘人以木铎徇于路。”杜预注云：“逸书。遘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

① 许维遹. 吕氏春秋集释：下 [M]. 梁运华，整理. 北京：中华书局，2009：647.

② 程少华. 中国古代舆论监督历史探源（上）[J]. 新闻研究导刊，2011（4）：77-79.

③ 鬻熊. 鬻子笺证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51.

④ 夏保国. 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0-53.

⑤ 郭绍虞，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63.

⑥ 夏保国. 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0-53.

歌谣之言。”^①“道人”是夏朝设置的一种官吏职务，除了宣传政令以外，专门负责搜集平民对于政事的看法和意见，以及民间各种情况。夏王派专门的官吏道人在路上敲木铎，巡行于各地，官员及百工众人可以歌谣的方式向道人进言。这样一方面宣达政令，起到政令下达之作用，另一方面进行民间采风，搜集民间舆论，实现资讯的上传，是一种典型的新闻传播活动。

对于采风制度化时间，有考古证据表明，在春秋孔子时代“采风”“观俗”的制度已经存在。“1994年上海博物馆自香港抢救入藏一批战国楚竹书，学者们将其定名为《孔子诗论》。……《诗论》共有简29枚，既有对‘诗’的总体论说，对风、雅、颂思想内容以及各自特点的高度概括，又有对具体‘诗’篇的点睛之评，其中对于《邦风》的论述尤为精辟，是《诗论》的精华。其中第3、4号二简明确讨论‘采诗’‘观俗’之事以及‘邦风’之用。简文如下：‘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第3简）。曰：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豫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第4简）。’^②第3简称所谓‘邦风’即‘国风’，整理者认为今传‘诗经’之《国风》原当为《邦风》，汉人避刘邦之讳乃改‘邦’为‘国’。^③而所谓‘纳物’，即言采纳、包容多种物象；‘溥’通作‘普’或‘博’；所谓‘观人俗’，‘人’通‘民’，即指考见民风民俗；‘大敛材’，整理者据《周礼·地官》‘八曰敛材’为收集物资，亦应与上文‘物’相应而微异。”^④

采风制度化与统治需要密切相关。统治者通过采风一可“观俗”，二可“观政”，从而实现对统治策略和方式的调整和完善。

① 春秋左传集解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917.

② 刘信芳. 孔子诗论述学 [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16.

③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琴竹书（一）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9.

④ 夏保国. 周代采风制度与“诗谏” [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0-53.